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文化焦虑的成因探析*

章征科

摘要: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文化偏离其原有常轨陷入危机,因文化自信的失落及文化重建屡遭挫败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产生明显的文化焦虑心理。变局和过渡时代意味着近代中国在列强侵略过程中遭遇了整体性危机,导致中国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构成了知识分子产生文化焦虑的时代背景。士大夫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时产生的身心冲突、新式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救国无力的现实感是知识分子产生文化焦虑的主体因素。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从根本上削弱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原有文化的认同,而将国家的衰败归因于中国文化,这是知识分子产生文化焦虑的政治因素。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原有文化的规范力、影响力和同化力遭到严重削弱,且在文化传承与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又产生了食古不化与食洋不化的冲突,凡此进一步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焦虑。总体上,文化焦虑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促使知识分子继续探寻中国文化的新出路。最终,在五卅时期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转机。

关键词: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社会转型;文化焦虑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5-0013-08

文化焦虑是一种社会集体心理状态,指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集体对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作用和价值产生迷惘、质疑乃至失望情绪的集中反映。本文所关注的文化焦虑是指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文化在中西文明冲突中偏离其原有常轨陷入危机后,由文化优势向文化劣势转化时文化自信的失落,以及文化重建屡遭挫败后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文化焦虑作为群体性现象,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洋务运动中开始酝酿,中经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重挫,并伴随着“弱国心态”“病夫心态”“亡国灭种”危机感的形成而呈加重之势,到民初社会混乱状态中达到高潮。五四时期随着民族觉醒的深入,知识分子、政派、政党的文化

自觉发挥作用,文化焦虑现象得到一定的缓解。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文化焦虑体现为:用急迫的功利心理向西方及日本学习;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紧张与冲突;文化决定论的产生;极端的还用自杀方式以殉文化。焦虑之后产生的危机感、紧迫感及由此开展的“保教”活动和文化重建是其积极反应的选择;焦虑中产生的急躁及极端自大、自卑、保守则是其消极反应的状态。此外,清末民初日益激烈的新旧文化冲突在某种程度也能反映知识分子文化焦虑的状态。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焦虑的实质是近代中国被动卷入世界体系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民族存续与个人生存危机交织在文化心理上的集中反映,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其复

收稿日期:2020-05-30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皖籍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国文化自觉研究”(AHSKY2015D1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章征科,男,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安徽芜湖 241002),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共党史研究。

杂的背景与原因。

一、时代因素：变局、过渡时代演进与中国整体性危机的加深

晚清之际，中国社会已处于不断衰败之中，龚自珍称其为“将萎之花”“日之将夕”“将倾之大厦”，更糟糕的是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其他列强也纷纷逼签不平等条约，加速其衰败。1856年列强又强迫清政府修订条约，英国、法国寻找借口，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在内外交困中一败涂地，甚至连京城都沦陷了，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者付之一炬，“天朝上国”的尊严扫地以尽。两次鸦片战争的发生使中国进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且此时国内以太平天国（利用西方宗教思想）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对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构成了直接挑战。19世纪70年代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特别是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直接导致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王朝建立在“天下观”基础上的宗藩朝贡体系彻底瓦解崩溃。康有为指出“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1]139}。进入20世纪，中国彻底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梁启超称中国进入“过渡时代”。

时局变化标志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郭嵩焘指出：“洋人之强，与其逼处中国危害之深，远过于前代。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于学，逼处环伺以相诘难，而我贸贸焉无以应之，实亦吾辈之大耻。”^{[2]196-197}面对这样的时局，清政府的表现却是手忙脚乱，未能采取合理应对之策，使中国不断陷入被动之中。

变局和过渡时代使国人逐步形成世界眼光，在看世界的过程中国人的焦虑心理逐渐加重。特别是在了解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崛起后，强化了中国人的焦虑。黄遵宪强调：“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3]1162}甲午战争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谭嗣同“四万万齐下泪，天涯何

处是神州”的诗句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悲愤与迷茫。庚子之乱，中国遭遇更大耻辱。秋瑾满怀悲愤，在《柬徐寄尘》中写下“祖国沦亡已若斯”“只愁转眼瓜分惨”的诗句^{[4]125}。人们开始怀疑中国固有的文化，吴汝纶指出：“中国之学，有益于世者绝少，就其精要者，仍以究心文词为最切。……然在今日，强邻棋置，国国以新学致治，吾国士人，但自守其旧学，独善其身则可矣，于国尚恐无分毫补益也。”^{[5]97}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上自政府下至民间都产生了急迫改变现实的愿望，对所谓的新学饥不择食，有很大的盲目性。当时西学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食品足以为代”^{[6]97-98}。这种状况正是当时社会陷入焦虑之中的反映。所以梁启超认为“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7]4}。

变局和过渡时代是列强迭次入侵的结果，也是中国人对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观的认同和接受的过程。它改变了中国人习惯的天下格局，彻底颠覆了中国人赖以理解世界的历史观和宇宙观，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中国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前途未卜。因为列强的侵略不仅有强大武力为后盾，还伴随着强势文化的扩张。而且，中国过去自以为“先进”，是“天朝上国”，经鸦片战争转眼变成落后国。

变局和过渡时代又将新旧时代冲突、现代与传统的对立摆在中国人面前，迫使中国人必须作出选择。在中西冲突中，魏源等承认了西方有“长技”，而冯桂芬则强调中国在很多方面“不如夷”，从而启动学习西方的历程。再经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更产生了“病夫”心态和文化自卑心理。列强的强势所形成的压迫感致使中国人的危机感空前加重，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学习列强以变法自强的愿望和要求。同时社会上保守倾向也日益严重。另外，在中国学习西方过程中，崇洋媚外风气日渐浓厚，文化虚无主义亦开始盛行。1902年张之洞指出：“今日略知西法，办学堂者动谓读经书为无益废时，必欲去之，百喙一谈，牢不可破，此大谬也。”^{[8]107}

如此现状,中国文化中经学独尊基础的话语权开始消失,中国人的社会归属感和文化自信感也逐渐丧失。

变局和过渡时代意味着近代中国遭遇了整体性危机,中国走向何方成为困扰国人选择的新问题,而且中国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被破坏,中国自有的文化经验性传承被中断,中国人的自身生存及中国文化的选择和发展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总之,变局和过渡时代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在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文化焦虑心态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主体因素:知识分子的身心冲突及救世无力感的不断累积

文化活动的主体是人。近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大变动背景之下,政治变革、文化重建、思想启蒙成为知识分子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时代难题。但知识分子却无法顺利地解决这些难题。因为士大夫群体出现了严重分化,士大夫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时产生了巨大的身心冲突。同时,新式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过程也产生了边缘化等现象。

(一)知识分子的身心冲突

在近代西方优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士大夫感到自己过去所学的四书五经之类竟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而学习西方又被人目为“用夷变夏”。这表明知识分子原本立德、立言、立功的文化环境开始丧失。他们对西学的学习无法做出正确选择,出现了严重的功利化现象。同时,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维新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缺陷及受到来自守旧士大夫的阻挠,其重建中国文化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相反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大胆怀疑与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削弱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所以他们一方面产生文化认同的内在冲突,另一方面其“保教”的目标未能达成。革命知识分子崇拜革命,提出“革天”“非圣”主张。虽然其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国粹派,一方面主张复兴古学,但另一方面又批判传统文化,但他们的文化之根仍是中国原有文化。

所以罗志田称晚清士人及由其转变而来的新

式知识分子是“身已新而心尚旧”,他们与时代“有意无意间总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9]135}。这种身心分离和冲突的结果是知识分子要么失去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要么失去心灵的宁静而致精神失落,或者陷入美国学者列文森曾所指出的理智与情感选择的两难困境之中。中国人理智上逐渐认可了西方价值,情感上却认同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总体上,“中国文化的氛围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陷入了新的困境,因为新的选择并不容易,而对旧的进行新的防卫也同样是困难的。”^{[10]38}

(二)知识分子的分化及地位边缘化的影响

知识分子在近代大变动时代,由于家庭背景、学习生活、人生态度、政治立场的差异日益分化。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下,从政治立场上看有革命与保皇之别,有反袁拥袁之别;从文化选择上看,有西化与国粹之异;从文化情感上看,有文化自卑与文化虚荣之分等。而且知识分子尽管很努力,但在清末民初还是产生了社会和文化上的双重边缘化问题。

自从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士作为社会中心的社会地位就此丧失。且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其他群体也日渐疏离,这也加速其地位的边缘化,“作为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知识分子可以与其他各社群都有所关联,但其浮动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其他社群的疏离,而疏离的结果就是自身的边缘化”^{[9]138}。与此同时,近代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背景下,逐渐“武化”,武力成为维护个人或群体“中心”地位或进阶的重要手段,这使知识分子发挥文化作用的空间受到极大压缩,最终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象。

(三)重任在肩与救亡无果的结局导致知识分子的无力感

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最有责任担当的群体。这种担当一方面源自传统士大夫的治平观追求,另一方面源自传统士大夫弘道意识、忧患意识和天生的责任感,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无论于己于国都进行了艰苦的奋斗。他们有很高的自我体认,或以上流自命,如林白水在1904年时指出:“现在的

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11]909}或以中等社会自居,明确自己的作用是带领下等社会以破坏上等社会,重建新中国。但这一努力过程并不成功,由于城与乡、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分离,在相当长时间内,知识分子与下等社会失去了联结的纽带。结果,知识分子群体的各种努力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军事救国”等都未能改变中国的现实处境。更有甚者,有的知识分子反而还醉心“欧风美雨”,成为“学奴”^[12]。

(四) 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现实环境落差悬殊的困扰

在内忧外患的近代,知识分子对学习西方以实现自强一直充满期待,冯桂芬希望中国“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13]50}。王韬也相信“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14]9-10}。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同样希望中国与欧美并驾齐驱。但近代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却是:中国不仅未自强,反而走向更严重的衰败,屡受列强欺侮,民族危机日趋加重。特别是在变局和过渡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用新的理论、新的眼光审视世界形势的过程中,发现世界的真实图景是弱肉强食,强国弱国的地位是天壤之别,弱国还时常面临亡国之危险。但中国知识分子却无力克服这一危险,这也使他们的失落感加剧。

所以中国救亡图存的紧迫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及对现实的救世无力感,在忧患意识的激发下,对知识分子产生文化焦虑无疑具有直接影响。

三、政治因素: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失败与政治混乱的交相刺激

文化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文化发展有赖国家建设,国家富强才会形成文化自信。张之洞提出:“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他强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15]36}但中国在清末民初的现实状况却是“国将不国”。

(一) 制度落后与发展趋向形成强烈反差

晚清以来,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弊端更加暴露,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结党营私,武备废弛,国力衰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复杂尖锐,清王朝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上衰败之路。中国的落后使清王朝根本无法与西方抗衡,也不断失去与日本抗衡的能力。究其原因,李鸿章感叹:“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中国无论是有贝之财,还是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冯桂芬指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3]49},而“人实不如”尤为严重^{[13]48}。特别是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导致他们学不到世界的新科技、新思想、新制度,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机遇。而世界发达国家所昭示的制度体制优势,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来居上之势使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更加相形见绌,越发使中国知识分子相信中国文化有惰性。

(二) 民族国家构建的艰难与失败

构建民族国家是知识分子学术救国的重要主张和政治实践的主要目标。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强调:“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6]35}。余一在《民族主义论》一文中认为:“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11]486}汉驹提倡民族建国主义,强调“组织民族的国家,建设新政府,为强立中国之基础,为保存汉种之本根”,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除革去卖国之旧政府,建设救国之新政府外,其道未由”^{[11]581,592}。

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却困难重重,无论是清王朝的改革转型,还是革命派的革命建国都未成功。国家构建的失败,一方面使文化发展失去依托,陈之迈指出:“根据近代历史上的实例,文化的保存与国家的完整,其实是一件事情。没有了国家,文化也就没有了根基,或说失却了寄托。”^{[17]23}另一方面近代民族国家构建失败迫使知识分子进行文化上的反思。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这些反思表明新式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原有文化未能对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形成有力支持,反而成为中国前进的阻力。这种认识从根本上

削弱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原有文化的认同。

(三)清末民初的政治混乱加剧新旧文化冲突

在清末民初,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未能造就文化重建所需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而且政治与文化还纠结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混乱状态。晚清改革进程除利用原有文化思想资源外,还曾中断了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制度与社会环境(主要是废科举,兴学校)。对革命,进步知识分子曾寄予美好的愿望,希望通过破坏重建的方式把中国引向光明。为推进革命,他们也往往借自己所了解的域外新知批判传统思想与文化。1903年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所撰序中指出革命不仅是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18]¹⁹³。也有革命者强调“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7]⁷³。

但改革和革命都未真正解决广泛的思想启蒙问题和文化发展问题,反而导致新旧文化冲突不断,文化往往成为被反思批判的对象,这在民国初期的帝制复辟和新文化运动中有充分的体现。

辛亥革命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政治发展并未走上正轨,经历民国初期极短暂的新气象后,中国民主政治遭遇失败。袁世凯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并试图通过帝制复辟,文化复古,期望以儒学作为整合社会的文化资源,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结果反使中国陷入更为严重的政治混乱之中,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先进知识分子反思辛亥革命失败和民国初期混乱时,把眼光集中于文化批判,这更加剧了中国新旧文化的冲突。李大钊感慨:“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19]⁴⁴因此,文化重建成为民国初期知识分子在反思辛亥革命成败时必须关注的现实问题,如何处理好古今中外文化关系再造新文化,显得更加紧迫。

四、文化因素:传统文化的衰败及新旧、中外文化冲突的加剧

中国文化本来有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

响,但进入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原有文化的规范性作用和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其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力也丧失了。在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过程中又产生了食古不化与食洋不化的冲突,这对清末民初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是极不利的。而近代文化对国家富强至关重要,蒋廷黻认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20]³中国文化未能实现近代化必然加重知识分子的文化焦虑。

(一)中国文化的衰败与教育改革收效甚微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受到清政府所实施的科举制度,以及与文字狱相结合的文化专制政策的影响,中国文化已然缺乏生机,“到了19世纪中国文化已经僵化了”^[21]⁶⁷。龚自珍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表达了当时的文化状况,人才短缺是其直接反映。

一方面随着新式教育体系的创立与发展,中国文化由“四部之学”向西方教育体系转变,原有经学的神圣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科举制度的终结进一步弱化了其影响力,虽有人倡导“国学”,也未能阻止其衰落,反而使新旧文化冲突加剧。另一方面新式教育的发展却很难适应救亡形势需要,因为无论是办学动机还是办学力量都是旧派人物在掌控。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竟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竟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藪也;士林中人,竟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11]⁵³⁷。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22]¹²⁶⁻¹²⁷。结果新式学堂的纷纷建立也无法实现文化振兴。

(二)西学东渐的冲击与中国知识分子选择性学习产生的冲突

由于近代西方工商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其中凸显了西方思想文化具有体系化、整体化优势。同时西方竞争性文化也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产生了激烈冲突。但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为适应时代潮

流,对西方文化进行了选择性学习,并借助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试图调适中外文化。

中国知识分子用“体用”“本末”“道器”等关系去论证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和互补,为此不少思想家提出和认同“西学中源说”以论证学习西方的可行性。但中体西用、西学中源说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局限。在中国人普遍接受西方进化论后,许多知识分子形成了西方文化先进与中国文化落后的认知,他们内心所形成的反差与冲突十分明显。同时清末民初经学在西学冲击下,其传统的一元观受到极大冲击,神圣性走向衰落,只成为一种学术了。所以在救亡图存的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选择性的学习加速了中国原有文化地位的衰落。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选择性的学习导致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冲突、崇古心理与趋新思想的冲突、食古不化与食洋不化的冲突。这些冲突一方面必然使中西文化交往出现偏差和失调。姜义华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行为中的这一现象,指出:由于形势紧迫,“驱使他们中间许多人匆匆地将两者简单地加以比附、黏合,结果,造成传统的旧学和舶来的新学双双变了形”^{[23]19}。另一方面必然使知识分子陷入焦虑之中。吴汝纶指出:“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湮灭,尤可痛也。独善教之君子,先以中国文字浸灌生徒,乃后使涉西学藩篱,庶不致有所甚有所亡耳。”^{[5]260}这诚如马勇所指出的“他们往往在新旧之间游动、漂移,表现出既对即将出现的新事物的向往,又对那将失去的旧传统的悲哀、忧伤和凄凉。模棱两可,莫衷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种状况是“那一个时代知识精英共同的理论特色”^{[24]124}。

(三)域外文化渗透与列强文化侵略的刺激

西方列强为了征服中国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除了利用鸦片的腐蚀、武力的打击之外,还十分注重从思想观念上进行西化、奴化以“改变中国”。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各地设教堂,办学校,开展文化奴役活动,培养其在华代理人,使中国基督教化。结果在受西潮影响的地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日渐式微,中国文

化的自主权也不断丧失,社会崇洋心理日益严重。鲁迅指出:“洎夫今兹,大势复变,殊异之思,淑诡之物,渐渐入中国。”他呼吁:“乌乎,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25]26.37}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西方乃至日本在19世纪后一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开始蔑视中国文化。列强大肆鼓吹黄祸论和文明等级论。对黄祸论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它一方面反映了西方一些反华分子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自大狂心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西方列强为宰割中国,攫取一己私利而相互挑拨离间的丑恶嘴脸。这一谬论严重玷污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毒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影响极其恶劣。”^[26]而文明等级论则强调西方是高等文明国家,而中国只是半文明国家,甚至是野蛮国家。“脱亚入欧”后的日本为美化其侵略行为,把自己打扮成文明的传播者,视中国人为低级动物,把清朝视为野蛮落后的象征,而极尽嘲讽之事。妖魔化中国也是列强惯用手段,其直接表现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歪曲,以此打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自尊。甲午战争后日本还借所谓“同文同种”和“大亚洲主义”的宣传来消解中国文化的独立性。

对列强文化侵略之目的,邓实认为欧美列强“其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务使其种如坠九渊,永永沉沦”^[27]。但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当时知识分子却无力遏止中国文化的衰败趋势,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致使中国人文化自信严重丧失,这必然会加重他们的文化焦虑情绪。

结 语

文化焦虑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中对时代环境、文化冲突、国家走向、自身处境等问题进行关注和思考而产生的,它与文化自觉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没有文化焦虑就不会有文化自觉。在清末民初,由于时代、主体、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些因素反映了中西社会发展传统的时代差异,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内在矛盾。特别是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强烈冲击导致中国产生走向何方的不确定

性,使知识分子陷入比较严重的文化焦虑之中。诚如严复所说:“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28]王造时曾总结说:“西方文明如排山倒海的冲来,我们固有的全个文明如遇洪水一般,只有崩溃下去。全个社会于是失却了基础。固有思想,制度,文物,皆被倾出固有的地位以外,而发生绝大的纷乱。”^[29]这种焦虑在五四时期达于顶峰。尽管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为重建中国文化进行了积极的努力、有益的探索,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建,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

但不可否认,这一阶段上的文化焦虑促进了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觉醒。戊戌时期康有为等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吸收国外新文化资源推进变法,提出“保教”主张。这是知识分子文化觉醒的重要过程。辛亥革命时期,鲁迅指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30]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主体性开始增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举起思想启蒙的大旗,在反思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其文化自觉的主体性进一步增强,他们强调“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31]。胡适潜心于“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创新工作中,思考探索“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的问题^[32]。梁漱溟开始探索如何在西方文化占优势的情况下寻求中国文化的地位。以毛泽东、周恩来、傅斯年、罗家伦等为首的青年学生群体在实现自身觉悟的同时,也担负起历史的责任致力于探寻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这表明五四时期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真正思考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他们反思批判中国文化的缺点,积极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秀成分,努力推动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0]。

这些意味着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已探索出中国文化自觉的两种路径:一是传承传统文化要吸收世界文化以促进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之

路径;二是引进西方新文化批判改造传统文化以形成中国新文化之路径。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危机,陈独秀、毛泽东和梁漱溟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思西方文化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将文化发展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既为中国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目标,又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新动力。由此,近代中国文化随着时代发展已然出现新的转机。

参考文献

- [1]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 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 郭嵩焘. 致沈幼丹制军[M]//郭嵩焘诗文集. 杨坚, 点校.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 [3] 黄遵宪. 人境庐诗草笺注: 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4] 徐寿凯, 施培毅, 校点. 吴汝纶尺牍[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0.
- [5] 郭延礼, 郭蓁, 编. 秋瑾集·徐自华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6]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朱维铮, 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7] 张枏, 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1卷上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0.
- [8] 璩鑫圭,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 [9] 许纪霖.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 [10] 列文森.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 郑大华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11] 张枏, 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1卷下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0.
- [12] 黄节. 国粹学报叙[J]. 国粹学报, 1905(1).
- [13]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14]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15] 张之洞, 何启, 胡礼垣. 劝学篇·劝学篇书后[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 [16]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7] 陈之迈. 政治学[M]. 重庆: 正中书局, 1941.
- [18] 汤志钧. 章太炎政论选集: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9] 朱文通. 李大钊全集: 第3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

- 出版社,1999.
- [2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21]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M].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
- [22]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23]姜义华.章太炎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 [24]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25]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6]方旭红.论“黄祸论”的形成根源及影响[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5-18.
- [27]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J].政艺通报,1903(23).
- [28]卢云昆.严复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29]王造时.中国问题的分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序文.
- [30]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31]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2]胡适.先秦名学史[M]//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On the Cultural Anxiety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Zhengke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culture deviated from its original routine and fell into crisis. Because of the loss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the failure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s group had obvious cultural anxiety. The changing situation and the transitional era mean that modern China encountered a holistic crisis in the process of invasion by the Great Powers, which led to the uncertainty of China's development trend. It was the era background of intellectuals' cultural anxiety.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intellectuals' cultural anxiety wer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conflicts from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 bureaucrats into new intellectual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new intellectuals and the helplessness of saving the country. The fail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state fundamentally weakened the intellectuals' recognition of Chinese original culture, and attributed the decline of China to Chinese culture. It was the political factor of intellectuals' cultural anxiety. Under the impac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normative role, influence and assimilation of Chinese original culture had been seriously weakened.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the conflict between "eating the ancient" and "eating foreign things" in China had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cultural concerns of intellectuals. In general, cultural anxiety promoted intellectual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hich urged them to continue to explore a new way out of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a new turning point appeared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Key word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ntellectual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anxiety

[责任编辑/云 扬]